責任編輯：張卓立 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

重塑正確歷史觀 彰顯中國抗戰貢獻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戰爆發88周年。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透過紀念活動，不僅讓後人緬懷先烈為保衛世界和平與爭取民族解放而作出的巨大犧牲，也在近年烽煙漸起的世界局勢之下警醒當代，必須要對歷史有正確的觀念。

鄧飛 立法會議員 教聯會副會長

筆者認爲，當中有兩個重點常被忽略：一，在進行抗日戰爭歷史教育活動中，講授中國軍民消滅日本侵略軍的重要性，理應不亞於講授中國軍民付出犧牲的重要性，但是中國軍隊擊斃多少日軍高級將領等戰績，在抗日戰爭歷史教育中卻絕少提及；二，警惕西方歷史學界一直存在的忽略中國抗日二戰史觀，這不僅要防止這類史觀干擾我們的抗戰歷史教育，同時也要向西方世界說好中國抗戰勝利的歷史故事。

突出抗日戰績 宣揚民族自豪

就第一點而言，中國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那麼我們除了紀念犧牲的軍民之外，同時也應大力宣傳中國軍民消滅了多少日本侵略軍，特別是其高級將領，以揚我國威，喚起後人尤其青年一代的民族榮譽感和勝利自豪感，筆者稱之爲「抗戰戰績史觀教育」。

在史學界中，有關日本侵略軍的死亡人數的資料亟需進一步整理和校對，以便教育界能將這些研究成果融入歷史教育的課程和教材中。雖然歷史文獻中有關消滅日軍的數據頗多，但是對於高級將領的死亡人數，記載卻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有的資料顯示在14年抗戰期間共擊斃約100名日軍將領，而另一些則認爲只有18名，這些差異使得資料的可信度成疑。

這種混亂主因是整體上對於「戰績史觀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例如，1939年八路軍在河北擊斃的陸軍中將阿部規秀，雖然被廣泛報道，但有些資料將其標記爲第一位在中國戰場被擊斃的日本將軍。事實上，也有資料顯示，認爲阿部規秀是第一位被擊斃的陸軍中將，在他之前已有數名日軍少將被擊斃。

此外，有幾個計算定義標準，是軍事歷史統計所通用：首先是被擊斃還是其他緣故死亡，包括病死、事故、自殺、被刺殺；其次可以再劃分死亡時的軍銜，還是死亡後日本軍方追贈的軍銜，這些都應納入統計考量中。學者應綜合中日兩國的歷史紀錄，並參考日本的官方戰史資料，例如《日本陸軍將官辭典》和《日本海軍將官辭典》等，以獲取更全面的信息。

至於第二點，中國抗日戰爭犧牲和貢獻遭西方史學界嚴重忽視。事實上，抗日戰爭又稱「十四年抗戰」，戰爭分爲兩個階段，一是局部抗戰階段（1931年至1937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中國軍民在東北抗日聯軍等組織的領導下展開游擊戰；二是全面抗戰階段（1937年至1945年）：七七事變後，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抗日軍侵略。

但非常遺憾的是，在國際社會關於二戰的主流敘事中，中國戰場的貢獻長期被低估甚至忽略。許多西方歷史著作將二戰的起點定爲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完全無視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便已開始的艱苦抗戰。這種偏頗的史觀不僅扭曲了歷史眞相，也削弱了世界對中國人民巨大犧牲的認知。

今年5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發表一份名爲《糾偏：80年來錯誤「二戰史觀」的綜述與中國應對之策》的重要報告，提出要正確理解二戰全貌，就必須打破和糾正幾種常見的錯誤史觀。根據上述報告，筆者總結西方史學界對中國抗戰的忽視論調爲以下3點：

1. 二戰「六年論」：西方主流觀點常將二戰定義爲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戰爭」，卻忽略中國自1931年開始的14年抗戰。

2. 「西方中心主義」：低估中國戰場的戰略作用。許多歐美史書將二戰敘述爲以歐洲戰場爲核心的戰爭，然而，早在1937年，中國就已獨自抵抗日本陸軍主力，牽制了百萬日軍，使其無法全力投入東南亞和太平洋戰場。根據日本歷史研究會的統計，中國軍民在二戰中傷亡3,500萬以上，佔世界總數的40%；中國軍隊共進行200多次重要戰役，殲滅日軍逾150萬、僞軍118.6萬，日本在中國戰場上死傷人數是其在二戰中死傷總數的70%。

3. 「日本受害論」：部分觀點過度強調日本在戰爭末期遭受的原子彈轟炸，而輕描淡寫南京大屠殺和重慶大轟炸等暴行，這種敘事不公，可能助長歷史修正主義，使後人對戰爭的眞相產生誤解。

尊重歷史眞相 講好中國抗戰故事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出現修正西方傳統二戰敘事的努力。例如，美國學者理查德·弗蘭克在其著作中，明確將亞洲戰場的起點界定爲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強調中國戰場的重要性。同時，中國學者也在系統研究中駁斥了「中國戰場無足輕重」的觀點。這些學術努力揭示了中國抗戰作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眞相。

正確的二戰史觀不僅關乎學術嚴謹，也承載對歷史的尊重與未來的警示，對我們的歷史教育有直接影響。講好中國故事，應包括講好中國的抗戰故事。

「軟對抗」危害大 認清本質堅決抵制

李梓敬 立法會議員

香港完善了國安法律，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明目張膽的反中亂港行徑銷聲匿跡。但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再提醒，要警惕「軟對抗」。

的確，樹欲靜而風不止，花樣百出的「軟對抗」仍然暗流湧動，千方百計干擾破壞香港來之不易的安全穩定、聚焦發展的大好局面。社會各界必須齊心協力認清「軟對抗」險惡本質，堅決抵制，守護香港長治久安。

愼防假民意擾亂施政

所謂「軟對抗」，並非明刀明槍、暴力衝突，而是以隱蔽、潛伏、欺騙的方式，打着不同名義，製造謠言、誤導公衆，從而達至挑戰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定的目的。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講，這些「軟對抗」分子猶如「小人滿街」，雖不拿刀槍，卻用言論、資訊和文化等方式進行煽動，影響民心。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指出，「軟對抗」是透過一些看似和國家安全無關的議題作爲切入點，利用假新聞、假消息或者偏頗報道等，通過輿情、網上發酵等手法分化社會，或是挑動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矛盾或者其他負面的情緒，「從而煽動市民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

舉例來說，近日香港文匯報揭發「本土研究社」以以偏概全的手法抹黑特區政府發展生態旅遊，就是「軟對抗」的典型例子。

「本土研究社」以環保、保育爲名，撰寫不少看似專業的報告，卻被眞正的專家踢爆是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刻意誤導市民，製造社會恐慌。譬如針對特區政府推出的生態旅遊項目，他們聲稱發展就必會破壞生態，煽動市民提交大量範本式的反對申述書，營造假民意，企圖阻礙香港的正常發展。

市民對「本土研究社」的反應最能說明問題。在白泥及尖鼻咀一帶，居民紛紛指出，這些所謂的環團從未眞正落區考察，卻閉門造車、紙上談兵，毫不關心當地居民因缺乏發展而面對的生活困境。有村代表甚至指責他們活在象牙塔，根本不了解實情，只懂得「抽水」搞「軟對抗」。

事實上，世界各地的例子早已證明，保育與發展並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共融互惠。新加坡、哥斯達黎加等地的生態旅遊項目，都是在保育的同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推動經濟增長，並獲得國際認可。但「本土研究社」偏偏視而不見，只選取個別負面案例作文章，明顯是另有用心。

提高市民辨識能力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周年論壇作主旨致辭時表示，「要清醒看到，反中亂港分子賊心不死，各種『軟對抗』花樣翻新，外部敵對勢力對香港插手干預一刻也沒停止，反滲透、反顛覆、反分裂的鬥爭沒有結束」，「大家要擦亮眼睛、認清本質、堅決鬥爭」。

香港在2019年發生修例風波，好不容易回復法治穩定，絕不能讓隱形「小人」乘虛而入，以「軟對抗」手段再度攪亂香港。每一位香港市民都責無旁貸擦亮雙眼，齊心協力抵制「軟對抗」。

首先，特區政府必須提高警覺，主動揭露「軟對抗」的虛假資訊及誤導言論，並盡速澄清，避免市民受誤導。例如針對「本土研究社」的失實報告，發展局及專業人士應及早介入，用具說服力的數據及事實，駁斥其錯誤言論。

其次，必須加強公衆教育，提高市民媒體素養及辨識能力。正如李家超所言，「軟對抗」往往是「道貌岸然」的，若市民輕易相信某些片面資訊，就容易被誤導。因此，學校及社區應定期舉辦媒體識讀課程及講座，教導市民如何分辨眞假資訊，明辨是非。

第三，全社會應共同發聲，揭穿這些「假環保、眞搞事」的團體。「本土研究社」的活動明顯已超出環保議題，甚至有意製造社會分化，挑戰國安底線，公衆應齊聲譴責，向這些「軟對抗」勢力說不。

注入多元發展動能 提升香港競爭力

蔡冠深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早前發表的「港澳平」署名文章，強調香港回歸祖國彰顯出「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對香港工商界抓住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注入了強大信心，具有重要的啓示作用。筆者深信，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各界定能更好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家高質量發展建設，以實際行動加強發展動能，開創更富競爭力的新篇章。

全力支持配合法治建設

今屆特區政府銳意革新，提出「以結果爲目標」的施政理念，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促成行政立法高效協同，營造穩定的營商環境，堅定工商界共建美好香港的信心。對於工商界如何在變局中開新局，全面深化推進發展動能，筆者有以下幾點觀察。

第一，維護國安鞏固繁榮基石。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使香港特區更有效應對不斷變化的國安風險挑戰。中國首艘自主研發航空母艦山東艦訪港，更凸顯祖國對香港的關愛與支持，以及保障香港長治久安的能力。香港法治是全球資本選擇香港的定心丸，更是企業長遠發展的護城河。工商界必須全力支持和配合法治建設，讓香港法治之都的名片更加閃亮。

第二，創新求變謀發展。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此時此刻，香港工商界必須勇立潮頭，以識變、應變、求變姿態，全力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並把握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潛力，積極打造國際創科高地，爲香港注入創新動能，推動高質量發展。香港與內地工商界尤其可針對量子計算、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領域，加強開展聯合研發、成果轉移等合作，共同吸引海內外創新資源，配合內地科創企業出海。

構建世界級品牌地位

第三，打造國際品牌中心。工商界可推動舉辦「世界品牌及知識產權交易會」，構建世界級的品牌檢測、認證體系和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以及推動在香港主辦「世界品牌日」，借助香港在品牌設計、營銷、會展、質量檢測、法律、金融等行業在亞洲以至世界的領先地位，爲增強國家在國際品牌舞台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作出貢獻。

第四，發揮金融優勢配合內企出海。今年以來，香港新股集資額處於全球領先位置，香港可進一步優化上市規則，吸引海內外企業來港上市。香港更可積極推動完善人民幣金融基建，發展多樣化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並把握「互聯互通」深化擴容，以及《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等政策措施帶來的機遇，協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中華總商會作爲歷史悠久的愛國愛港主要商會之一，將全力支持行政長官李家超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揮商界與政府之間的重要交流橋樑作用，同時亦會透過深化與內地聯繫，培育更多愛國愛港青年人才，進一步壯大工商力量，尤其善用商會龐大的國際聯繫網絡，積極向外推介香港與內地優勢，推動創新合作與多邊發展，齊心協力建設更繁榮美好的香港。

善用紅館搞活「演唱會經濟」

葉傲冬 民建聯秘書長

啟德體育園的開幕，使香港演出場地長期緊缺的問題，迎來了緩解契機。如今，部分大型演唱會移師至可容納5萬人的啟德體育園，令紅館在未來有望重新定位，爲歌手提供更多檔期，以確保有實力的藝人有更多機會在紅館演出。此舉對香港的文藝生態有重要意義，這不僅是藝術家的福音，更可助香港鞏固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並對弘揚如粵劇等中國傳統文化有所助益。

根據特區政府的計劃，紅館的重新定位將爲演唱會預留珍貴的檔期，並預留個別康文署場地作長期演出和粵劇表演之用，這旨在爲不同類型的表演場地分配更合時宜的文藝活動。作爲一個歷史悠久的場館，重新定位將有助紅館成爲多種藝術形式的展示平台。同時，康文署將優化場地的資源分配，騰出更多檔期供不同藝術團體使用。當「實力派」藝人們都擁有更公平地使用紅館的權利後，不僅讓創作人有了更明確的進階目標，亦令觀衆有機會接觸到更多元和豐富的舞台表演。

雖然，紅館從「體育優先」轉向「演唱會場館優先」的做法可提升經濟效益，但特區政府需避免過度的商業化擠壓受衆較少的藝術。因此，預留粵劇場地僅是改革的起點，未來需擴展至更多小衆的藝術形式，以確保小衆的文藝事業可茁壯成長。

粵劇作爲代表香港的本地文化之一，同時亦是香港首項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承載了深厚的歷史和豐富的藝術價值。據稱，特區政府將會預留沙田大會堂演奏廳爲粵劇場地，這意味着粵劇將獲得更多的表演空間和資源的支持。而東九文化中心作爲擁有先進科技設備的嶄新場館，亦可在推動粵劇的多元發展作出重要助力。特區政府還可考慮與本地藝術團體合作推出更多跨界演出，將粵劇與現代舞蹈、流行音樂等不同藝術形式相結合，創造出具創意和吸引力的演出，吸引更廣泛的觀衆群體認識傳統文化，激發年輕一代對此的興趣，形成良好文化交融氛圍，進一步推動香港傳統文藝事業的多元發展。

其實，場地個性化是一個極具潛力的策略，能夠滿足不同類型演出的需求，而不同的場地擁有不同的特色和氛圍，這對藝術家和觀衆來說也是一種新體驗。啟德體育園的現代設計和先進設施，可爲體育和大型演出提供理想環境，而紅館則可通過其歷史背景和文化沉澱，吸引對傳統藝術和舞台劇等感興趣的觀衆。此舉可爲不同藝術形式提供更貼合其特性的舞台空間和技術支援，有助提升演出水平與感染力。

紅館的重新定位解決了以往場地短缺的問題，爲香港的文化藝術界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這不僅象徵着特區政府對文化藝術生態系統優化的決心，標誌着特區政府在推動本土文化繁榮作出了積極作爲，其潛在影響亦對整個文藝產業鏈有着深遠影響，尤其是對香港本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發展，以及場地個性化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引入議員守則 提升履職質素

梁熙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正審議《立法會議員守則》，目標在明年組成的新一屆議會實施。方案自公布後引起了社會普遍支持，認爲可以讓議會有更一致、更清晰、更透明的問責機制，有助加強立法會效率，更好地服務香港社會。

有個別聲音質疑，《守則》的出台是否意味着現屆議會出現一些問題，所以才要採取行動填補相關漏洞。實際上，引入《守則》是立法會始終保持精進不休的態度、不斷自我完善的體現。正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回應傳媒時提到，作爲完善選舉制度後首屆議會，從2022年開始至今，已通過117項有利經濟、民生、社會發展的政府和議員法案，較上屆同期多出98%，相關的成績是經得起考驗。現時立法會根據過去四年的實踐經驗作出進一步的優化，更反映了議會上下並不滿足於現狀，大家共同期待有更好的表現以回饋社會對新選制的支持，是議會持續進步優化的一大特色。

過去不少議員同事都會透過定期的工作報告，向社會交代過去的工作情況，同時亦有鞭策自己繼續進步的作用。不過由於現時的《議事規則》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過去按月、按季、按年發布的工作報告，並沒有劃一的準則；當中的內容，有人會側重於傳媒報道、有人注重議會工作，同樣沒有一致的方向和側重點。結果市民收到了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議員工作報告，雖然個別衡量的話也看到了不少工作成果，但假若要橫向比較的話，一方面令市民難以量化議員的工作效能，同時亦欠缺了公平的比較標準，對於議員亦有欠公允。

因此，是次引入《守則》，明確了相關的要求，限制了工作報告提交的時間至每年度完結後的兩個月內。再者，未來立法會或提供工作報告範本，讓議員可以按指定的格式完成，讓市民有一個更加清晰的標準比較各議員的履職水平。

《守則》亦會設立多層級的處分機制，由書面警告、當面訓誡、議案訓誡、譴責甚至暫停議員職務，都比過去任何一屆議會更爲嚴謹。過去就算有議員蓄意挑戰《議事規則》，充其量只是被驅逐離開，在下次會議時又可若無其事出席，明顯缺乏足夠的阻嚇力。《立法會議員守則》則提出加入「停賽」機制，日後議員在暫停職務期間將不獲發酬金及津貼，明顯有更大警告作用。

整體而言，推出《立法會議員守則》能督促議員表現符合市民期望，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立法工作的實際需要，值得社會支持。